



周国平集哲学家与畅销书作家两个身份于一身。研究尼采的哲学思想奠定了他在学界的地位，而一系列富有哲理的散文，又让他走向大众。近两年，这位哲学家经常受邀参加演讲，一个比较常见的话题是“幸福”。在焦虑情绪尚比较普遍的今天，哲学家周国平如何解读幸福？近日，周国平在济南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幸福的哲学》、《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
周国平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年6月出版

对话周国平——

哲学家的幸福与困惑

□本报记者 吉祥

幸福的生活不是没有困惑

齐鲁晚报：您的新书是谈幸福的哲学。现在社会上谈“幸福”的书很多，不少是心灵鸡汤式的，成功学式的说教也很有市场。您对此有什么评价？

周国平：心灵鸡汤看你怎么定义了，很多人说我的东西也是心灵鸡汤，但是我不承认。其实心灵鸡汤是很肤浅的，而且很雷同，就是一些小哲理加点小情调、小故事，基本是这样的模式，掌握了这个模式，可以批量生产，实际上没有自己的思考。我觉得真正有思想含量的东西，一定是这个人被某个大问题困扰，他努力思考，去寻找答案，讲出来的东西一定不是可以炮制的，一定有他

独特的地方，因为是他的问题，他就不能用似是而非的东西给自己解决问题。心灵鸡汤基本是似是而非的，成功学就更不用说了，那就是垃圾，什么幸福的秘诀，大家一起喊什么话就幸福了，我觉得真可笑，这是非常丑陋的社会景象。

齐鲁晚报：您在写《幸福的哲学》的时候，有没有困扰您的问题？可能很多人有这样的感觉：不幸福，活得很焦虑。去年茅于軾老先生还写过一本书《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您又如何看这种普遍焦虑的社会现象？

周国平：对我来说，困惑是有的，焦虑少一些。因为焦虑是具体

的，焦虑是你某种愿望受到挫伤后的情绪，但我现在好像没有这样的强烈愿望，在这一点我看开了。但你说困惑、苦恼的话，每个人都会有，我不认为幸福的生活是排除了困惑和苦恼的生活，那样就不是人了，也不是在寻找幸福，而是在寻找怎么当神仙，那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应该的，那不是人的状态。关键是我们为什么事情困惑、烦恼，我觉得不值得为鸡毛蒜皮的事情苦恼，但现在很多人都在为这些东西烦恼，所以我把幸福分成两个层面：一个是个人幸福，那是由你的价值观决定的，另一个是公民幸福，那是和整个社会的状态密切相关的。

实用品格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毛病

齐鲁晚报：您提到西方有一个重视精神追求的传统，但我们好像更强调有没有用，更功利一些。

周国平：我一直说中国文化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实用品格，做任何事情，哪怕是精神领域的，也要问有没有用。一定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功用，才承认它是有用的，如果看不见、摸不着，但对精神有用，我们也不认为那是有用的。这实际上是颠倒了。人是万物之灵，精神属性是人的高级属性，精神属性本身的满足难道对人就没有用吗？为什么高级属性的价值要用能不能满足低级属性来评

价呢？当然人的低级属性也要满足，人要生存。但是在生存问题满足后，就要把人的精神属性的发展，满足放在主要地位，解决生存问题的目的是让你作为人生活。

齐鲁晚报：您之前有篇谈知识分子的文章，说中国之所以产生不了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科学家也和这种实用主义的传统有关。

周国平：这个问题我很早就谈了，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请我去做讲座，我讲了严复和王国维的例子，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当

时的角度是，中国人接受西方哲学的时候有很大的困难，因为西方哲学的核心是一种精神的追求，我们接受的时候主要是为了实用，当然也情有可原。比如严复，接受英国自由主义思想的时候，他是为了中国能够富强，所以他往往对西方自由主义里面强调自由本身就是价值这一点看不明白，他强调自由了以后，每个人的能力就能发挥，然后这个民族就能进化，就能富强。当然这也有道理，但是这还是一个大实用。精神本身的价值是什么，我觉得这一点我们特别难接受。

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要做“公知”

齐鲁晚报：您理想的知识分子状态是怎样的？是入世的，还是与这个社会保持一定距离？

周国平：实际上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而且我相信知识分子也应该是多类型的，不应该是一种类型。一个社会需要特别关心现实的、能够对现实问题发表见解提出批评的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现在被称作公共知识分子，我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是需要的，但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得去做公共知识分子，都对当前的政治、社会问题发表意见，首先人的志趣不一

样，比如我就不适合当公共知识分子。

除了公共知识分子以外，还需要另外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和现实保持距离的，能够从人类更根本的价值去想问题，但是中国的传统强调知识分子要关心现实。按照儒家的传统，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就是要成为帝王师，结果最后帝王师没当成，成了幕僚，其实很多公知也想当幕僚，结果还当不了。当然有些公共知识分子是很好的，是真正的公知，有骨气，我也很欣赏，但这样的人并不多。

齐鲁晚报：有没有一个理想的知识分子的样板？

周国平：民国以前的封建社会，没有知识分子的传统，只有一个文人传统，但文人的正道就是去当官，当不了官就去当隐士，儒道两家嘛，基本就是这样。当然里面也有一些勇士，对当时的社会进行批判，最后给自己招祸，但是没有形成一个知识分子独立观察社会、提出自己意见的传统。知识分子的传统是民国开始形成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西方的影响。

哲学被教育搞坏了

齐鲁晚报：作为一个哲学家，在您看来，对一般人而言，哲学是不是一种奢侈品？

周国平：既是奢侈品又是必需品。对于一个还要为生存挣扎奋斗的人来说是奢侈品，但从根本上是必需品。哲学的含义是“爱智慧”。什么叫爱智慧呢？就是不愿意糊里糊涂地活着，要把人生的道理想明白了，才能活得踏实一些，这就是爱智慧，这个难道不是每个人的需要吗？谁愿意糊里糊涂地活着？但是很多人没看到这一点，或者他对哲学没概念。哲学的概念已经被我们的教学搞坏了，认为就是那些教条的东西、意识形态的东西，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没有经过真正的哲学训练，全是说教，讲一些大人不相信、孩子听不懂的话，认为这就是哲学，我觉得很荒谬。

齐鲁晚报：您的另一本新书《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是思考人文精神的，20年前有一个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在您看来，当年提到的诸如文人精神萎缩、功利主义等问题在今天是否依然存在？

周国平：问题当然存在。实际上我觉得那次讨论不够深入，是有问题的。我了解那次讨论的背景，那些人都是我的朋友，这里面有一种情绪，我当时就感觉到了。你回想一下，1980年代初的时候，知识分子多荣光啊，在中国的舞台上扮演着英雄、精英的角色，自我感觉特别好，但是到1990年代初被边缘化了，当时讲得最多的一个词是失落，知识分子的失落，人文精神的失落。作为知识分子，你的社会角色暗淡了，你就失落了。这就是问题，我觉得这种心态是不对的。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还是一个精神定位的问题，就是知识分子要对这个社会的精神走向进行观察，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你自己是有精神追求的。但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有个毛病，过于看重自己在社会上的角色。然而这种社会角色和他的精神追求往往是脱节的，甚至他自己没有多少精神追求，只在那里喊口号，指点江山，这是很大的问题。如果你一贯有自己的精神追求，是不会感到严重的失落感的。这实际上是角色感的挫败，而不是精神上的觉醒和痛苦。



《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
周国平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悦读·分享

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信“青未了”